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研究 ·

# 我国供给侧改革的背景、理论模型与实施路径<sup>\*</sup>

冯俏彬 贾康

**内容提要:**当前,全球经济正处于工业革命以来第五波长周期的下行期,而这正是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处世界政治、经济的大纵深背景。从供给侧分析,作者认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机制是因应需求而由劳动力、资本、土地与自然资源、科技创新、制度这五大要素形成的不同组合形式以及由此所产生的综合效率。基于这五大要素及其运动规律考察视角,本文构建出供给侧要素组合及结构性改革的理论模型,并以此为基础廓清政府、企业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各自定位。基于长周期视野与要素运动的理论模型,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立足当下,放眼长远,实施“三步走”战略:第一步是从低效过剩领域释放要素,可具体化为当前正在实施的和推进的“三去一降一补”;第二步是深化劳动力、资本、土地与自然资源、科技创新、制度等五大要素市场的结构性改革,促进要素自由流动;第三步是大力振兴实体经济、发展新经济以优化要素配置,这是衡量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否取得成功的主要标志。

**关键词:**新供给 结构性改革 长周期 要素运动 新经济

以往的研究(贾康、冯俏彬,2015;贾康、苏京春,2015,2016)已经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以“攻坚克难”为核心内涵,即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有效制度供给问题,以进一步解放生产力、支持我国现代化进程的时代选择。我们始终力求从理论密切联系实际视角,形成条理化、系统化的新供给经济学认识框架。本文进一步阐释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处的大纵深历史背景,并基于要素及其运动规律,构建出我国供给侧要素组合及其结构性改革的理论模型,进而廓清政府、企业在供给体系与供给侧改革中的各自定位,并描绘出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路径与目标方向。

## 一、长周期:我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纵深时代背景

诸多迹象表明,长周期正在按其大致的节奏来临与演化。在经济学说史上,俄国经济学家、统计学家尼古拉·康德拉季耶夫曾在1925年所著的《经济生活中的长期波动》一文中,运用英国、法国、美国 and 德国等主要工业化国家的价格、利率、进口额、出口额、煤炭和生铁产量等时间序列统计资料,总结出经济发展存在着长度为50~60年的长期波动,其中前20年左右是繁荣期,经济发展一派兴旺;其后将经历一个10年左右的衰退期;接着步入10年左右的萧条期,最后迎来10年左右的回升期。在其所研究的1780—1920年这140年中,资本主义经济已经历了两个半长周期的波动<sup>①</sup>。这就是著名的“康波周期”,亦即生产力发展周期理论。

约瑟夫·熊彼特和其他许多经济学家也认为,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的确存在着“繁荣”“衰退”“萧条”“复苏”四个阶段并相互循环,但熊彼特重点指出技术创新是推动经济呈现周期性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在他看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经济增长的周期也就等于技术革命的周期。据此,他把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分为三个长周期:一是从18世纪80年代到1840年,纺织工业的创新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二是从1840年到1897

<sup>\*</sup> 冯俏彬,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邮政编码:100089,电子邮箱:qbfg666@163.com;贾康,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邮政编码:100142,电子邮箱:mofjk@icloud.com。本文受到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把握经济发展趋势性特征加快形成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体制机制和发展方式研究”(15ZDC009)资助。感谢匿名审稿人的意见,文责自负。

年,创新进入蒸汽和钢铁时代;三是从1897年到20世纪50年代,是电气、化学和汽车工业创新引领的时代。<sup>②</sup>以此扩展开来,可以进一步看到,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也经历了一个由半导体技术创新肇始的电子信息时代,时间长度也约为50年左右。在此之后直至当下,技术革命的浪潮正一路推进到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时代,大数据、云计算等重大技术进步伴随信息化、全球化进程,正引领世界在“和平与发展”主题下展开新一轮的创新大潮,3D打印、人工智能、机器学习迅速兴起,“共享经济”方兴未艾。

正如生物进化中存在“蹦移”<sup>③</sup>,技术进步特别新旧交替之际也往往伴随着某种间断与回退。2008年发生的世界金融危机打断了此前高歌猛进的全球化进程。从那时到现在,时间已过去整整9年,整个世界仍然处于危机后的阵痛时期与高不确定性时期。其主要表现是:美国经济温和复苏但不稳固;欧洲经济持续低迷,欧盟在英国“脱欧”公投之后前景未卜,多国右翼势力抬头;日本长期处于几乎零增长的停滞中;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同样也面临较大困难。为了刺激经济,欧盟、日本等多个国家央行开启了“负利率”时代,而在国际关系层面,则是民族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明显抬头……。在相当大程度上说,当今世界发生的深刻变化,正是这一轮长周期变化的具体表现。我们可在熊彼特周期理论的基础之上,继续刻画出第四波长周期的图形和第五波的前半部分,如表1所示。直言之,当今世界经济正处于第五波长周期中的衰退期。

表1 工业革命之后的四个长周期

	繁荣	衰退	萧条	回升	标志技术及产品
第一波	1782—1802	1815—1825	1825—1836	1838—1845	纺织机、蒸汽机
第二波	1845—1866	1866—1873	1873—1883	1883—1892	钢铁、铁路
第三波	1892—1913	1920—1929	1929—1937	1937—1948	电气、化学、汽车
第四波	1948—1966	1966—1973	1973—1982	1982—1991	汽车、计算机
第五波	1991—2007	2007—(2017)	(2017—2025)	(2025—2035)	信息技术

资料来源:周金涛、郑联盛(2010)关于康波周期的相关研究以及作者个人观点;表中数据为周期起始和结束年份,括号内年份为本文作者估计。

长周期理论的重大启示在于:既往两百多年中,经济增长与繁荣主要源自那些改变世界历史的重大技术突破所引爆的产业革命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结构“跃升”;反过来说,经济衰退与萧条也主要是因为技术红利的消退,即新技术这棵大树上“低垂的果实”被享用殆尽所致的产业和经济结构老化。但纵观整个历史,人类的发明与创新精神永不止步。假以时日,新的技术革命必将来临,而经济也将重归增长与繁荣,人类社会也因此进入下一个高速发展期。

长周期理论明确了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历史定位。它清楚地表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世界经济恢复尚需时日,全世界可能还需要十年以上的时间耐心等待。与之相适应,已进入新常态的中国经济,要迎来下一次繁荣与快速增长,同样也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它也清楚地表明,唯有技术层面发生的重大突破,方能引领世界经济彻底走出衰退与下行的泥淖,发展新经济势所必然。长周期理论还提示我们,在各个阶段转化之际,往往新旧交织、结构性矛盾频现,这与近年来我国在“黄金发展期”特征仍存之时却进入了“矛盾累积”“隐患叠加”风险期的现实情况也基本一致。结合我国实际来看,长周期理论所揭示的“第五波”,在时间段上基本上与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我国实现现代化“三步走”战略中的“第三步”(2000—2050)重叠(贾康、苏京春,2016),也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时间段完全一致。因此充分认识这一背景,不仅有利于加深对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历史纵深与时代背景的相关认识,而且能从理论上进一步明晰新技术、新经济的发展对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极端重要性,更加深刻地认识并合乎逻辑地推演出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向与实施路径,意义十分重大。

##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模型

### (一)影响经济长期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是供给侧的五大要素

基于经济增长理论和新供给经济学等方面研究的已有成果,我们在肯定需求的原生动力意义、又明确供给对需求的响应机制是生产力水平阶跃式发展的关键性动力贡献基础之上,从供给侧把经济增长的要素抽

象为劳动力、土地与自然资源、资本、科技创新、制度(含管理)这五大方面。笼统而言,这五大要素不可缺少,对经济增长都有贡献。但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它们的相对贡献又有所不同,且不同要素相互之间的组合情况在极大程度上影响乃至决定经济增长态势及其综合效益。所以,适应经济增长的阶段转换、在五大要素的结合方面“推陈出新”、顺应规律创新发展就十分必要。

五大要素形成经济增长的一组函数,其理论模型可用式(1)表示:

$$G = f(L, R, C, T, I) \quad (1)$$

其中, $G$ 代表经济增长, $L$ 代表劳动力, $R$ 代表土地与自然资源, $C$ 代表资本, $T$ 代表科技创新, $I$ 代表制度与管理(冯俏彬,2016;贾康,2016)。经济学意义上的要素,是指所有经济主体在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时,都会涉及的主要投入。但在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时期,各要素的作用力度和影响效应,则各有不同。一般而言,在经济增长的早期,劳动力、土地、资本是最明显、最主要的要素,在经济体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科技创新、制度这两大要素一般会表现出巨大的潜力以及对冲前三项因素支撑力滑坡的重要价值,甚至成为全要素生产率(TFP)的主要贡献因素(贾康,2015;彭鹏、贾康,2016)。放眼未来,从技术变革的角度看,五大要素中还可考虑加入“数据”或“信息”这个新兴要素。

以上五大要素还可以做两个层次的划分:一是流动性、竞争性较强的要素,主要包括劳动力、土地与自然资源(使用权、开发权层面)、资本、科技创新;二是非流动、非竞争性要素,主要是指制度。之所以如此区分,主要是因为制度安排以及由此生成的制度环境虽然也始终处于变迁之中,但总体而言属于慢变量,属于由生产力发展所决定的生产关系范畴,要经由诱致、压力等综合作用而不断发生演变、进化,最后才形成特定历史条件下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供给体系。简言之,制度供给是对经济社会生活中已经存在的制度需求所做出的相对滞后、相对稳定但又具有显著能动性作用的响应(贾康、冯俏彬,2004),其所提供的有利于或不利于竞争性要素充分流动、顺畅重组的环境与条件,也就总和而成为有利于或不利于“解放生产力”的生产关系、社会形态。

## (二)要素始终处于循环往复、相互继起的运动过程之中

从“经济人”假设出发,人类的经济活动过程就是为满足人的利益而发生的供给与需求互动的无限循环过程,亦即社会再生产过程。在供给侧,劳动力、土地及自然资源、资本、科技创新等诸种竞争性的要素始终处于不停息的运动过程之中,其运动的方向是以效率最大化为目标,在一系列的竞争中最终落实于“用户体验”最大化所形成的市场占有率与回报水平。简言之,效率与收益是引导要素流动的直接驱动力,而用户体验的提升是收益驱动带来的社会检验机制与运行客观结果,也是最根本的支持力量。进一步说,促成要素流动的基本机制是竞争中社会平均利润率的形成过程,即凡是回报低于社会平均利润率的行业或部门,要素将会流出,且回报率越低,要素流出的驱动力越大;凡是回报等于社会平均利润率的行业或部门,要素会处于相对稳定状态;而凡是回报大于社会平均利润率的行业或部门,要素将会流入,且流入的数量与速度,与该行业的实际利润率高出平均利润率的程度成正比。就一个行业而言,随着要素的流出或流入,其收益将逐渐向社会平均利润率收敛,直到等于社会平均利润率,此时要素运动便在此行业归于相对稳定。笔者建立式(2)来表达上述意思<sup>④</sup>:

$$K_i = \Delta R V_i^{R_i} t_i^{\frac{1}{\Delta R_i}} \quad (2)$$

其中, $K_i$ 为第*i*行业要素流入总量; $R_i$ 为第*i*行业的利润率; $R_a$ 为社会平均利润率; $\Delta R = R_i - R_a$ , $V_i$ 为第*i*行业单位时间要素流入量; $t_i$ 为第*i*行业资源流入时间。其含义是,某行业在某一确定时期内所吸进来的要素总量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利润率水平、竞争性要素的数量、时间。具体而言,某行业的要素总量与该行业的利润率成正比,与劳动力、资本、土地和自然资源、科技创新(通常表现为科技成果)等某种单一要素数量成正比,与要素进入或退出的时间快慢成反比。从动态的角度看,当 $\Delta R_1 > \Delta R_2 > 0$ 时, $V_i^{R_1} t_i^{\frac{1}{\Delta R_1}} > V_i^{R_2} t_i^{\frac{1}{\Delta R_2}}$ ,要素加快流入;当 $\Delta R_1 < \Delta R_2 < 0$ 时, $V_i^{R_1} t_i^{\frac{1}{\Delta R_1}} < V_i^{R_2} t_i^{\frac{1}{\Delta R_2}}$ ,要素流出;当 $R_i = R_a$ 时, $K_i = 0$ ,要素处于均衡状态,即不流出,也不流入。从全社会视角观察,在任何时点上,要素都处于三种不同而又紧密相连的运动状态之中:

第一,向外释放。基于资本逐利的驱动,与其伴随的竞争性要素永远在寻找既定条件下的收益最大化,

那些不能达到社会平均利润率的领域,将失去要素的青睐,要素会从这些领域流出。这种要素释放过程越是便捷顺畅,越是有利于社会生产力潜力的发掘和经济运行总绩效的提升。

第二,向内吸引。从低效领域释放出的要素所进入的流动过程,是以寻找收益更高的领域为方向。越是收益高的部门或领域,越能吸附要素前来集聚。在这种吸附机制发挥作用时,要素能否流动以及在何种便捷程度上能够自由流动,是关键性的影响条件。

第三,重组。各种要素的流动形成重组过程。一旦要素找到更高的收益机会,将如铁屑被磁石吸附一样集聚,进而还会产生一系列“化学反应”,在互动中有机结合,逐渐形成特定的结构特征,并最终体现为某种产业部门结构和经济结构。整体而言,要素始终在或紧或松、或快或慢地实行重组,由此生成的经济结构也就不停息的过程中动态演化。越是便捷灵活的释放、吸引运行机制,要素的重组越有效率和质量,相关的结构状态也越具有效率上的合意性。

这种关系与过程,可以用图1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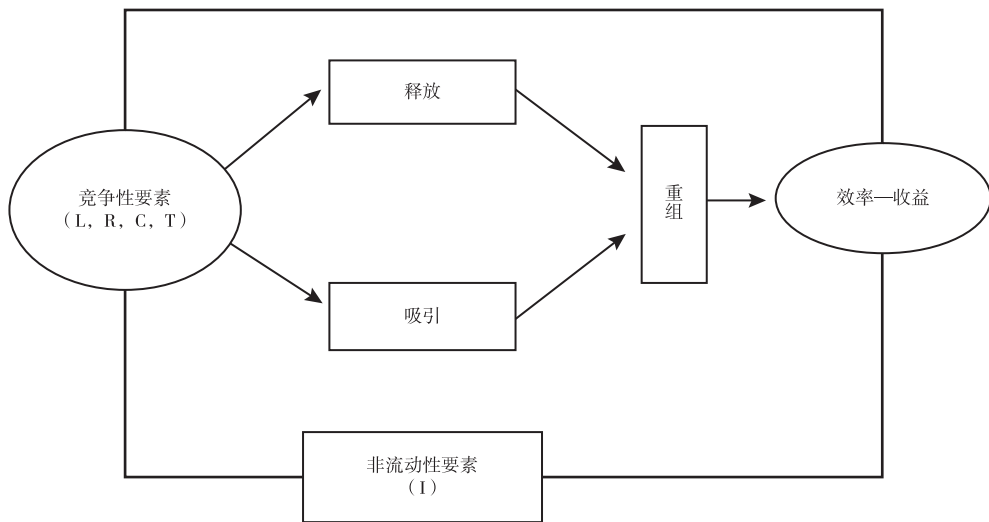


图1 经济社会中的要素运动图示

当然也要指出,以上三个前后相继的要素运动过程主要是一种理论抽象,就某一具体的时间地点而言,要素永远同时处于三个状态之中。由于经济发展中整个体系自身的异质性,以及“破坏性创新”在不同领域中发生的非均衡性、突发性、间断性,因而总有一些领域利润率高而有另一些领域利润率低,总有一些人能发现与把握更多更好的盈利机会而另一些人则不能,所以各竞争性要素始终会处于不停息的运动过程之中。正是这种寻求更高回报与利润的内在驱动机制,经由供给回应需求,形成经济增长澎湃不息的动力。所以,经济增长的过程,也就是要素不断寻求得到更高回报的过程。反过来,要使经济不断增长,就必须为要素在流动中去寻求最大回报创造更加自由、灵活的条件,提供更为丰富的机会。

那么,要素的释放与吸引机制是否灵活、便捷,要素重组与结构动态优化过程是否顺畅,主要由什么决定呢?这是由供给侧五大要素中的非流动、非竞争性要素——制度供给起决定性作用的。如前,制度安排与“制度环境”当然也是处于变迁之中的,但总体上属于慢变量,是由生产力发展所决定的生产关系范畴,它由经济社会发展的种种因素所诱致、所推动,经由渐进的自然演变和主动设计,最终形成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供给。但制度一旦形成,就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处于相对稳定状态,影响并塑造着一个社会中所有主体的激励机制与行为方式。对于我国这样的转轨经济体,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这一伟大制度变迁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发展与不断完善,过去是、现在也是实现我国经济增长和现代化战略目标最具根本性的决定因素。

### 三、正确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政府与企业定位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战场是要素市场建设。基于上述理论模型表达的要素运动理论,可以比较清楚地回答一个各方高度关注的问题: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政府与市场主体(企业)各自应如何定位?在要素

流动、互动所实现的资源配置中,应怎样分工合作?

落实到与经济增长相关的各个不同主体上,五大要素可以进一步细分成以下三个层面:

第一,微观层面。一般厂商或企业在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时,涉及的要素主要有三个:劳动力、土地和自然资源、资本,可简称为“人”“地”“钱”。不同的企业家,运用自己独特的眼光与才能,把这三个要素组合而成特定的生产或者服务供给能力。在一个经济体中,大部分的企业是在这个层面发挥其市场主体作用。

第二,微观与中、宏观结合层面。大企业集团、跨国公司、行业龙头企业等在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时,除了以上三个要素之外,还会特别注重科技创新这一要素。这是因为,一方面对于大企业而言,科技创新能力决定着其核心竞争力的高低和“百年老店”式长寿生存发展的能力,事关大企业是否能保持行业中的龙头地位以及能否获得超额利润;另一方面,由于科技创新所具有的巨大的不确定性,往往耗费巨大,一般只有大企业才有实力进行长期、巨额的投入。此外,在工业化中后期的发展中,一大批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寻求创新发展的中小企业,在与“新经济”同向而行的风投、创投、天使投资基金支持下,也把科技创新作为关键性的发展支撑条件和成长突破口,力求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并成功地以“硅谷经验”而引领了新潮流。再往上一些,无论是大企业集团,还是科技型中小企业,都可将自己的科技创新活动与政府在中观、宏观层面提供的产业政策、技术政策和财税金融政策等相结合,追求科技这一“第一生产力”与经济社会结合所产生的巨大乘数效应。这正是因为人们从世界产业发展史中深刻地认识到,科技创新和实现重大技术突破毫无疑问是“阶跃式”经济发展的直接动能源泉和主要支撑力量,政府必须注重从支持基础教育、基础科研入手,培育创新与创新能力,同时积极以产业政策、技术经济政策和财税政策等助力科技创新的达成。

第三,宏观层面。这一层面属于政府的主要作为空间,对应的是作为慢变量的制度要素供给。制度经济学已经充分证明,制度对于推动一国经济实现增长和繁荣具有极端重要性,而政府是社会中唯一的、垄断性的正式制度供给者(同时也是非正式制度强有力的影响、引领者),所有其他的主体——企业、家庭、个人等——都是在政府以公权力维系的制度规则的“天花板”下面行动。比如,以政府为主体的国土开发顶层规划,是所有市场主体进行各色各样要素组合的综合性前提(贾康、苏京春 2016),与“自然垄断”有关的通盘不动产和网状系统的空间配置,也必须纳入政府为主体的规划这一制度供给之中。进一步地,政府还要从宏观上统筹设计运行与收入再分配相关的制度体系,如税收、福利、抚恤救济等,以求正确地权衡、处理经济生活中一向存在的“公平(均平)”与“效率”的矛盾关系(贾康,2012)。总之,由政府主导所形成的有效制度供给这一要素,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无与伦比。已有研究表明,无论是工业革命发祥地英国、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世界头号强国美国,还是 20 世纪后半期崛起的“亚洲四小龙”、改革开放中迅速发展的中国都提供出了“制度变革促进经济增长”的绝佳案例,而在撒哈拉以南、中东一些国家所出现的贫穷与战乱,与它们缺乏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以及有效的制度供给密不可分。当然也要看到,政府发挥作用的“有力”“有为”内在地需要与其职能、作用范围的“有限”之间形成合理匹配,政府主导下的有效制度供给应当形成“包容性”的机制特征,才能契合人类文明发展的主导潮流和适应微观主体在要素流动中发挥潜力、活力的客观需要。

因此,依以上认识来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在逻辑,认识政府与企业关系在这一框架中的各自功能与作用定位,可简要归结为四点:

第一,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企业(由企业家主导)的作为空间,是积极改进以劳动力、土地与自然资源、资本、科技创新为主要内容的要素组合状况,提高所供给的商品或服务的质量和效益,在优胜劣汰中形成和提升核心竞争力。

第二,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政府(由决策官员主导)的作为空间主要是改革、改进制度供给与推进制度创新,特别是在“生产关系的自我革命”中攻坚克难、改变那些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经济社会管理规则、方式与机制,为企业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创造更好的“高标准法治化”包容性环境和条件,释放出经济社会的一切发展潜力与活力。

第三,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政府不能也不应当下到企业层面,下到要素具体组织层面,过多介入产业调整与企业重组等具体事项。应当特别注意尽量不用、慎用行政性手段去组织实施所谓“达标”,而应当力求供给与施行那些能有效引导出市场主体合意行为的相关制度。

第四,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政府与企业要找准合作领域,优化合作机制。政府与企业合作的领

域主要在科技创新,无论是大企业还是科技型中小企业,都可与地方政府乃至中央政府所提供的产业政策、技术经济政策和财税、资金政策等相结合,以形成和发挥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的引领作用和乘数效应。另外还要创新政府与企业的合作机制,近几十年愈益得到重视和长足发展的 PPP(公私合作伙伴机制,我国官方文件用语为“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不仅提供了在公共工程、基础设施、产业园区与新城连片开发等方面的政企合作新机制,而且也各类要素的组合创新提供了广阔舞台。此处关于政府与企业定位的考察,实际上已从“完全竞争”假设出发考察“必然”,又扩展到加入“非完全竞争”考量的“应然”认知框架,如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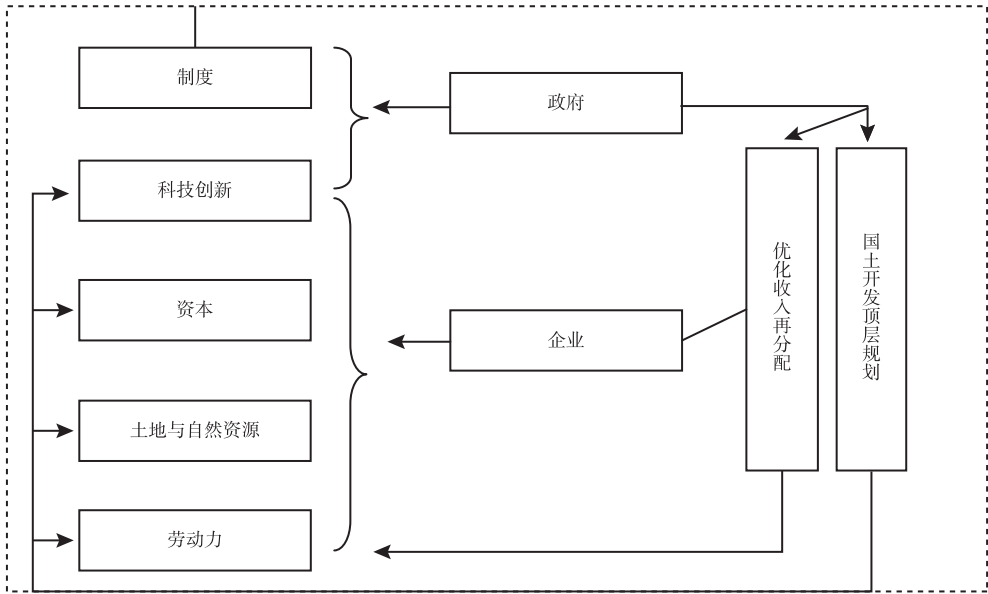


图 2 要素视角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政府与企业的定位

注：图中虚线表示国土规划、收入分配为两项作者最为看重的政府制度供给。

#### 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路径

当前,我国以“三去一降一补”为切入点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经在各地展开,不少人形成了一个偏于简单、狭隘的认识,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完成这五大任务。对此,有必要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做出进一步的分析以扩展相关认识。

基于要素“释放——吸附——重组”的运动规律和长周期理论所指示出的技术方向,可以看出,我国供给侧结构改革要考虑一个既有先后顺序、又紧密相连的“三步走”战略:第一,从低效、过剩领域中释放要素,体现为完成“三去一降一补”这五大任务;第二,深化结构性改革,系统性地优化制度要素的有效供给,促进竞争性要素的自由流动;第三,积极抢抓新技术革命的机遇,大力发展新经济并基于“互联网+”战略推动传统产业升级换代,以形成要素优化配置的“升级版”,为迎来新一轮经济增长与繁荣夯实基础。

##### (一)从低效、过剩领域中释放要素:以五大重点任务为切入点

2015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的“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这五大任务,主要针对的是过去刺激政策留下的“后遗症”,目的是推动市场出清,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一是积极稳妥“去产能”,优化供给结构。目前重点针对的是钢铁、煤炭、水泥、造船、电解铝这五大产能严重过剩行业,通过提高产品、质量、环保等标准,治理“僵尸企业”,淘汰落后产能、释放宝贵的要素资源。当前,需要特别注意防止在去产能过程中过于夸大行政力量的作用。对于为数不多的成规模的大型企业,如能认定是不可救药的“落后产能”的组成部分,固然可以便捷地使用“关停并转”行政性手段来加以迅速处理,然而面对我国总量已达七、八千万的全部市场主体,政府没有能力去一一甄别占绝大多数的中小微企业中谁是落后产能的代表,真正的有效机制是促进公平竞争,充分发挥市场“优胜劣汰”的作用。甚至所谓“过剩产能”,其划分界限实际上也是飘移不定的,“有效投资”的创新机制如 PPP,可以把一部分过剩的产能,转变为非过剩的有效产能,所以“去



产能”的真谛是形成正确的激励约束机制,以市场竞争“优胜劣汰”地淘汰落后产能,而不是依靠政府去严格划定过剩产能而后关停之。二是“去库存”,消化房地产供给侧的冗余存量。目前,我国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库存严重,已成为拖累经济的重要因素。今后一个时期,要以多种政策手段与经济杠杆的合理组合,来积极化解这部分房地产库存,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三是防范风险“去杠杆”,确保经济安全。近年来,我国杠杆率上升较快,其中既包括宏观上的广义货币供应量指标偏高,又包括非金融企业的负债率指标偏高,需要具体设计合理可行的风险控制方案,防范化解风险因素。四是多举并重“降成本”。目前我国各类制度性交易成本过高,特别是税外的“五险一金”、行政性收费及其他各类隐性成本等,造成企业综合负担很重,需要从财税、金融、社保、流通、能源、廉政建设等多个领域发力,以配套改革打好降低企业成本的“组合拳”。五是雪中送炭“补短板”,扩大有效供给。这就要补足经济社会发展中明显形成的短板、瓶颈等方面,如精准扶贫、优质教育、普惠医疗、多种形式养老、城乡基础设施升级、科技创新重大事项、“三农”发展等,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更好的条件。

## (二)破解阻碍要素自由流动的壁垒和障碍:深化重大关键领域的改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本质属性是改革的“攻坚克难”。从供给侧角度看,目前在我国要素流动方面,存在着明显的不当约束与抑制。这与制度壁垒和过度垄断密切相关,亟须通过深化改革,降低准入、消除壁垒,从而为要素自由流动创造良好条件和环境。

第一,国有企业改革。由于历史原因,当前正在进行中的去产能、去杠杆、去库存等工作,在相当大程度上都指向国有企业,因此国有企业改革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首当其冲。改革的方向应坚持政企分开、明晰产权、顺应市场规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与治理机制,实施混合所有制战略重组,将国有企业的改革与民营企业的发展纳入共赢的轨道。

第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这一改革的目的是规范政府的行权方式,管住管好政府这支“看得见的手”,把简政放权做到位。政府一方面应从对大量经济社会事务的具体管理中脱身出来,另一方面积极加强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等方面的职能,按“大部制”和“扁平化”原则对整个政府机构进行系统化改造,以优化市场环境、释放经济社会活力。

第三,金融与投融资制度改革。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资金是市场经济运行的血液。投资这一重大经济支持因素,需匹配融资的杠杆力量并有效地防范风险。针对我国金融体系长期存在的结构性失衡、金融产品的多样化严重不足和金融风险因素频发等等问题,今后应积极引入多元金融和投融资主体,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加强金融宏观审慎监管和促进互联网、PPP等“新金融”和新型投融资机制建设,配套深化改革。

第四,财税改革。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与重要支柱,是政府与企业、中央与地方、公权体系与公民间财力分配体系与基本经济关系的枢纽性机制。需要坚持分税制改革大方向,按照扁平化取向构建中央、省、市县三级架构,以“一级政权,配有一级事权、一级财权、一级税基、一级预算、一级产权、一级举债权”为体制原则,再配之以中央、省两级自上而下转移支付的现代分税分级财政制度,形成优化处理中央与地方财政体制设计方案,推动税收制度由间接税为主转向直接税为主,合理形成地方收入体系,深化预算制度改革等,形成良好的经济社会利益分配与调节机制。

第五,科技制度改革。创新对于今日之中国,其重要性无论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当务之急是基于教育改革破解人才培养的“钱学森之问”,以科技改革打造符合科研规律的创新体系,长效支持基础科研,大力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经济的融合,在高端“买不来的技术”特定领域要靠原始、自主创新艰难前行,在中高端则依靠全面开放和“拿来主义”、将“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与“集成创新”相结合,最终建成“创新型国家”。

第六,土地与不动产制度改革。土地制度和不动产制度是国家的基础性制度,关系到国计民生方面重大利益格局的优化,需要政府在配套改革中长远谋划、审慎把握、积极推进。土地制度改革的难点主要集中在农村集体经营性用地、农民承包地和宅基地等的流转机制、城乡结合部征地、拆迁、补偿等方面。应积极总结重庆“地票”、土地收储制度和深圳化解原住民土地与不动产历史遗留问题的实践经验,结合国家已推出并有明确时间表要求的不动产登记以及《物权法》规定的用益物权自动续期、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的加快立法、适时推进的房地产税改革等事项,攻坚克难,化解多种矛盾,打开通向长治久安的新路。

第七,优化人口政策与劳动力市场改革。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最根本的支持因素。随着我国人口红利

的逐渐消失和老龄化社会压力的逼近,必须在“放开二胎”后继续优化调整我国人口政策,将以计划生育为核心的人口控制模式,果断过渡到以优生和提高人口质量为核心、更加鼓励生育的人口战略。同时,要大力完善与人口流动密切相关的户籍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等,以真正形成城乡一体化、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 (三)优化要素配置:大力促进实体经济升级和积极发展新经济

从低效过剩领域释放要素和通过结构性改革促进要素自由流动,是要引出要素按市场规律形成资源优化配置这一各方期待的结果,提升供给侧经济体系的质量和效益,解放生产力。结合前文关于长周期的有关理论认识、当前世界产业结构在新技术革命大潮中的变化以及我国经济增长中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的新要求等,我们可以做出一个重要判断,即以优化资源配置为目标的要素运动,必将流向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和大力发展新经济这两个方面。换言之,在经济增长新阶段上,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所必需的实现实体经济升级和新经济的发展,将是衡量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否取得成功的主要标志。

供给侧改革的根本目标之一是振兴实体经济。要以制度、科技为抓手,聚焦全要素生产率,支持我国实体经济向上冲破“天花板”,实现产业的转型升级。历史地看,我国珠三角、长三角等增长极区域实行的“腾笼换鸟”式的经济结构调整,正反映了原来支撑我国一路走到“世界工厂”“总量全球第二”的低廉劳动成本、土地开发潜力等比较优势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正在逐渐消退,必须进行新一轮的产业转型升级。“腾笼”就是要把相当大一部分传统制造业产能转移到国内欠发达地区或周边经济体,这和改革开放初期这类产能由外部向我国转移是一个道理。“换鸟”就是要实现产业、产品的升级换代。但如腾了笼而换不来鸟,冲不破向上跃升的“天花板”,那就将被憋住而痛失好局。温州所代表的挫折局面,已对我们敲响了警钟。因此,促进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势在必行。

供给侧改革的根本目标之二是大力发展新经济。新经济主要是指基于互联网为基础的经济创新发展成分,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所产生出的新产业、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二是传统产业在“触网”(“互联网+”)后所打开的新空间、新领域,涉及全部一、二、三次产业,既有“三产”中的电子商务等新兴产业和业态,也包括“二产”中的智能制造、基于社会化大生产的新型定制化生产等,还涉及“一产”中有利于推进适度规模经营的“订单农业”、家庭农场、“产超直通”以及农业与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等等。当前,我国已经成为互联网第一大国。根据《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15)》,截至2015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6.88亿,比整个欧盟的人口数量还要多,互联网普及率为50.3%;手机网民规模达6.2亿,无线网络覆盖明显提升,网民Wi-Fi使用率达到91.8%。与之相适应,我国的互联网经济发展迅猛。目前世界上十大互联网企业中,我国占了四家。以阿里巴巴集团为例,其2015—2016财年的总交易额达到3万亿元人民币,已超越沃尔玛成为全世界最大零售平台,被业界视为零售业务由线下全面转向线上的标志。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5年全国网上零售额38773亿元,比上年增长33.3%。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32424亿元,增长31.6%;非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6349亿元,增长42.4%。有国际组织预测,到2020年我国零售市场的线上渗透率将攀升至22%,市场规模总计达10万亿元。再以当下仍处于“成长的烦恼”阶段的分享经济为例,其发展势头更是令人称奇。根据《中国分享经济报告2016》的结论,2015年,我国分享经济市场规模已达到19560亿元,主要集中在金融、生活服务、交通出行、生产能力、知识技能、房屋短租等六大领域。分享经济领域参与提供服务者达5000万人左右(其中平台型企业员工数约500万人),约占劳动人口总数的5.5%。保守估计,参与分享经济活动总人数已经超过5亿人。展望未来,预计未来五年分享经济年均增长速度在40%左右,到2020年分享经济规模占GDP比重将达到10%以上。<sup>⑤</sup>新经济展示出的不可思议的潜力与空间,为处于经济下行阶段的我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带来了希望的曙光,也代表着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经济加快转型升级的前沿与大方向。放眼全球,当前世界正处于第三次产业革命的“人口”上,我国有望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站在争抢新经济制高点的同一起跑线上,能否抓住这一历史机遇,是中华民族能否实现伟大复兴、重回世界之巅的关键,迫切需要在继续争取运用好发展中经济体的“后发优势”的同时,有效形成供给侧发力“守正出奇”的结构性改革“先发优势”。

总之,我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鲜明的时代背景、长纵深视野与十分突出的现实意义,并可通过理论模型给予通盘考察,进而准确把握优化、提升供给侧诸要素质量与效益的基本要领。一言以蔽之,供给



侧所涉及的竞争性要素能否顺利释放、流动、重组,并形成从低效率部门向高效率部门的顺畅转移,是决定我国经济能否长期持续增长的本源性动力机制和关键性制度安排。纵观全局,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是意在“问题导向”之下,准确抓住阻碍增长的关键因素,以有效制度供给为龙头,解决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大踏步前进的迫切问题,向着“全面建成小康”“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挺进。只要方向正确、着力点清晰,我国完全有可能在当今世界性的结构性改革中,在即将到来的波澜壮阔的新经济时代,走在前列、先人一步,使我国这一曾经在前几次工业革命后落伍的文明古国在追赶一赶超的现代化过程中后来居上,并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 注:

- ①具体为:(1)从1789年到1849年,上升部分为25年,下降部分35年,共60年;(2)从1849年到1896年,上升为24年,下降为23年,共47年;(3)从1896年起,上升24年,1920年以后是下降趋势。到他著书之时,第三次长波的衰落期仍在继续。
- ②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
- ③又称间断平衡论,1972年由美国古生物学家N.埃尔德雷奇和S.J.古尔德提出,其基本意思是指物种进化是跳跃与停滞相间的过程,不存在匀速、平滑、渐变的变化,但新物种一旦形成就会有一个很长的时期处于相对稳定和平衡的状态。转引自凯文·凯利:《失控——全人类的最终命运与结局》,新星出版社2010年版,第129页。
- ④感谢西南财经大学陈建东教授所提供的帮助与支持。
- ⑤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研究部、中国互联网协会分享经济研究部:《中国分享经济报告2016》,http://www.sic.gov.cn/News/250/6010.htm。

#### 参考文献:

-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2016:《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人民出版社。
- 冯俏彬,2016:《供给侧改革:核心是制度创新与制度供给》,《政策瞭望》第5期。
- 冯俏彬,2016:《发展新经济关键要改进政府监管“旧”模式》,《中国经济时报》10月31日。
- 王俊秀,2016:《新经济》,电子工业出版社。
-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课题组,2016:《改善供给侧环境与机制、激发微观主体活力,创构发展新动力》,载《新供给、创构新动力》,经济科学出版社。
- 贾康,2015:《贾康自选集》,人民出版社。
- 贾康 苏京春,2016:《论供给侧改革》,《管理世界》第3期。
- 贾康 冯俏彬,2015:《十三五时期的供给侧改革》,《国家行政学院学报》第6期。
- 贾康 冯俏彬,2004:《制度供给的滞后性与能动性》,《财贸经济》第2期。
- 贾康,2012:《收入分配与政策优化、制度变革》,经济科学出版社。
- 贾康 苏京春,2015:《新供给经济学》,山西经济出版社。
- 贾康 苏京春,2016:《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中信出版集团。
- 贾康 苏京春,2016:《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信出版集团。
- 贾康,2016:《供给侧改革十讲》,中国出版集团上海东方出版中心。
- 贾康 苏京春,2016:《论顶层规划与供给体系的优化提效》,《全球化》第8期。
- 彭鹏 贾康,2016:《从新供给视角重新梳理和解读全要素生产率》,《财政科学》第8期。
- 周金涛 郑联盛,2010:《结构主义的薪火:周期波动、结构演进与制度变革》,《资本市场》第11期。

(责任编辑:何伟)

(校对:杨新铭)